

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吗？

——基于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分析

李 芳, 张志茹, 王 松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 要: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为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窗口,进而影响到审计师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本文选取 2017—2022 年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成一个面板数据集,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和文本篇幅;数字化机制会诱发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强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应计和真实两种盈余管理在该过程中体现出了差异化影响:在业绩和监管的双重考量下,数字化转型会诱发管理层利用真实盈余管理操控利润,进而对审计师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产生影响,而应计盈余管理在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中不具有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审计会更加关注数字化转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并相应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在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该研究结果对企业提高治理水平、审计师提高审计报告质量有启示作用,同时对利益相关者正确认识企业价值和投资决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盈余管理;数字技术平台;产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5)05-0082-1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虽能显著提升企业在运营、生产和创新等方面的效率,^[1]进而改善企业绩效,但转型引发的商业模式等多重领域变革也会加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减少股利分配^[2]和增加盈余管理活动^[3]³⁷。这些负面效应已经引起了审计师的关注。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制度赋予审计师更多自主表达空间。例如,2021 年,审计师在深圳爱施德公司的审计报告中指出,其数字化分销业务在数据收集与处理环节存在人工干预的可能性及相应舞弊风险,并将该问题列为关键审计事项;2022 年,北京紫光股份因其数字化基础设施及服务收入对财务报表具有重大影响,且存在管理层人为调节收入确认时点的风险,同样被审计师列为重点关注事项。这些案例表明,审计师已逐步将数字技术相关业务风险纳入关键审计事项的判断范畴,并倾向于披露更多、内容更为详尽的关键审计事项。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通过运用会计准则判断或安排经营活动以改变财务报告结果的行为,也是管理者获取私人利益的途径之一^[4]³。已有研究文献从数字经济^[5]、商业模式创新^[6]、管理层短视^[7]等多个视角,对管理层操纵企业盈余的动机进行了广泛探讨。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在重塑商业模式和赋能企业发展的同时,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从而为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

收稿日期:2024-10-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111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3CTQJ05)

作者简介:李 芳(1980—),女,山东菏泽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王 松(1980—),男,山东临朐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本文通信作者。

为创造了新的条件。目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有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昂且可能形成沉没成本,加剧管理层的短期业绩压力,从而增强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3]4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运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与制约,进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4]16}。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审计师通常通过增加审计程序、提高审计收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等方式予以应对^[8]。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行为具体产生何种影响? 盈余管理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中介角色?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不仅有助于企业优化治理结构,也对审计师提升审计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 2017—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盈余管理行为在其中的差异化影响,并进一步从审计机构类型与产权性质两个维度对影响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行为间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审计定价^[9]、审计风险^[10]和审计师选择^[11],而较少关注关键审计事项在识别数字化转型风险与信息传递中的作用。本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有助于完善数字经济背景下审计师风险应对机制的相关理论。二是,厘清了应计与真实两类盈余管理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过程中的差异化作用,尤其验证了真实盈余管理在该过程中的路径支撑作用。三是,从审计机构特征和产权性质视角出发,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技术变革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制度情境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风险增强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一方面,数字技术会引发企业在商业模式、竞争模式等多领域的变革,推动信息、物流、产品和资金等资源的整合与重新配置。此过程将会使企业业务变得复杂多样,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12]。企业数字化转型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盲目效仿同行业的转型行为可能导致战略决策失误^[13]。不仅如此,数字技术变革常伴随有业务流程重组、产品迭代以及顾客需求变化等问题,缺乏战略规划的模式易引发战略风险,甚至导致转型危机。此外,数字化对企业数据挖掘能力、资源整合效率以及跨部门协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在推进技术革新后,若不能及时调整人力、资金等配套管理政策,将导致数字化业务发展快于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造成内部控制暂时失效,从而产生控制风险^[5]。另一方面,业务复杂性的提高和内部控制缺陷会影响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及时性与可靠性。数字化所带来的各类风险也可能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通过操纵信息披露以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来试图抵消数字化转型中潜在的负面效应,最终导致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下降。上述由数字化带来的多重风险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均会强化审计师所感知的审计风险,这将具体表现为披露更多、内容更为详尽的关键审计事项。

新审计准则的出台增强了审计师提升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动机,进而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产生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有助于提高审计过程的透明度,加强对审计报告中重要信息与风险因素的呈现,从而提升报表使用者对审计工作的理解,并强化对审计师的外部监督^[14]。同时,此类披露也增加了投资者对审计判断及审计过程的了解,审计师面临的诉讼风险相应上升。依据深口袋理论,审计师有动机向财务报表使用者传递企业在数字技术转型过程中所隐含的潜在风险,以降低未来可能面临的监管处罚、投资者诉讼及赔偿风险。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引致的审计环境变化,要求审计师为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投入更多审计资源与努力。为应对数字化业务带来的新型风险与复杂性,审计师需提供与

之匹配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并增加相关审计事项描述及审计应对的文本篇幅,以全面反映审计工作和风险应对过程^[15]。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增加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

H1b: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增加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篇幅。

(二)数字化转型、盈余管理与关键审计事项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基于数字技术加速信息交互、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视角,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若技术创新与组织体系未能有效协同,可能引发“治理失灵”,加剧信息不对称并推高代理成本^[17]。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双刃剑”效应,既可能“强化治理”,也可能导致“治理失灵”。北大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在2023年中国新经济企业500强发布会上指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挑战。在这一阶段,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与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或未能与数字化进程有效匹配,因此更易出现“治理失灵”。首先,数字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可能对企业带来负面冲击,增加经营不确定性,加剧管理层的业绩压力,^[5]从而加剧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代理成本^[6]。为了维护个人声誉及薪酬水平,管理层有更强的动机隐藏负面消息,选择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价值创造。其次,内部控制建设滞后于数字化业务发展,可能引发控制风险,赋予管理团队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而导致公司资源被滥用以满足自利动机^[18]。最后,在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高科技企业的业务与盈利模式日趋复杂,进一步扩大了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数字鸿沟”。管理层可能借助技术手段更为隐蔽地进行选择性披露或定向信息释放,掩盖利益输送等行为,损害公司治理效能^[19]。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可能助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加剧代理问题。

盈余管理是衡量管理层自利行为的重要维度,也是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的具体表现之一,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可能诱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持续的战略更新过程,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难免面临资源约束与财务压力,经营风险与不确定性显著提升^[20]。由于“IT悖论”的存在,即数字化转型短期内未必带来业绩改善,管理层在转型“阵痛期”内承受的业绩压力进一步加剧^[21]。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积极倡导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数字化转型企业表现出明显偏好,外部投资者对其业绩预期也相应提高^[22]。根据印象管理理论,内部经营风险和外部市场预期共同加剧了管理层提升业绩表现的压力,管理层会更倾向于采用盈余管理行为迎合投资者对于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发展预期,隐藏负面消息。盈余管理可分为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其中,应计盈余管理通过会计政策或方法操控利润,隐蔽性较低,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所识别。而真实盈余管理通过构造交易来调整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现金流,隐蔽性强且较为灵活,往往难以为外部人员察觉。已有研究表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关系^[23]。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两类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而管理层更倾向于采取哪一种方式进行利润操纵,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新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更多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如实表达,操纵会计盈余不仅可能误导投资者决策,还可能损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24]。为满足资本市场改革对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审计师可能通过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缓解外部报表使用者在信息获取中的劣势。此外,数字技术冲击下盈余管理行为会提高审计师对相关风险的评估,进而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代理冲突与经营风险,从而提高了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促使审计师相应提升其风险估计^[25]。盈余管理行为会引起审计师的警觉,降低审计师对管理层的信任,并且使审计师推断出其可能有操纵利润、粉饰报表的动机^[26]。为降低自身面临的诉讼风险,审计师往往倾向于增加审计报告中有关注数字化转型下管理层操纵盈余的信息说明,披露更多、更为详细的关键审计事项。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2a:数字化转型会诱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强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H2b:数字化转型会诱发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强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作用路径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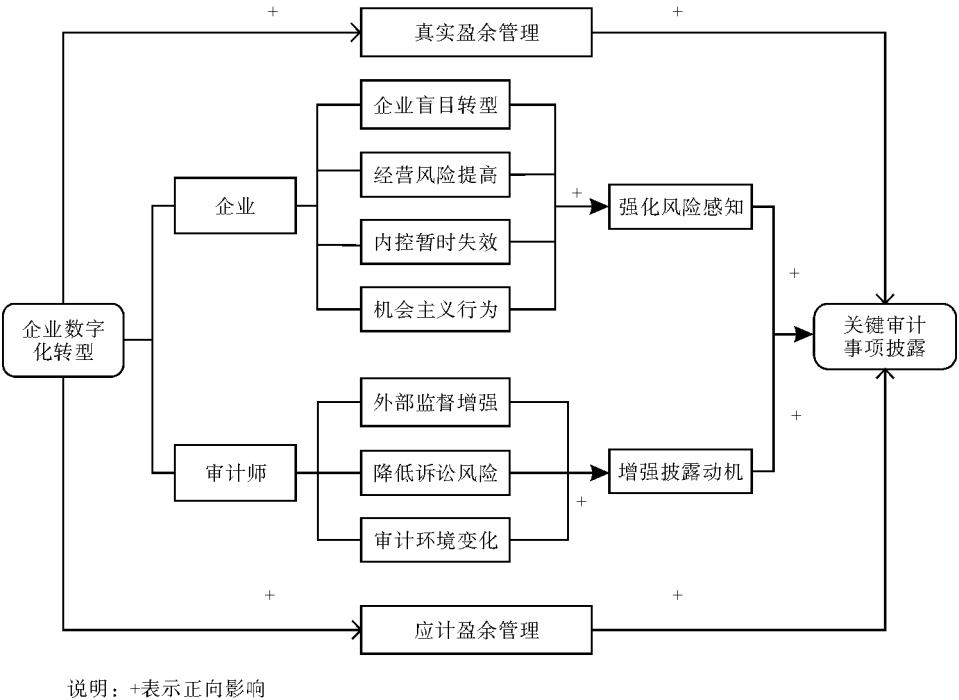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作用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审计准则开始要求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基于该政策背景,本文选取 2017—2022 年沪深交易所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剔除金融业样本、ST 企业样本、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11 452 个观测数据(样本数量以 N 表示)。为减少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1%分位数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通过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及审计应对方法的字数进行求和整理,得到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

(二)主要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格式、篇幅、文本相似性与可读性等特征,均可用于衡量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27]。本文参考李嘉宁等^[28]的研究,采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KAM)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包括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KAM_num)和文本篇幅(KAM_words)。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指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的个数,其数量可反映被审计单位所涉及重大或风险性事项的多少。披露数量越多,通常表明审计师对关键问题的识别越全面,披露越充分。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指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及“审计应对”方法段的字数之和。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文本篇幅越长,说明审计师采取了恰当的审计程序,识别重大错报风险和固有风险的程度越高,披露越充分。

2. 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基于年报文本分析的企业数字化程度(DT)进行测度。其构建方法如下:借鉴吴非等^[29]的

研究,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度,提取并统计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词频,将各维度词频加总得到数字化总词频。由于该变量呈右偏分布,为缓解极端值影响,本文对总词频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

3. 中介变量

关于应计盈余管理(DA)的度量,本文采用经琼斯模型计算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指标^[30]。具体计算如下:

$$\frac{TAC_{i,t}}{A_{i,t-1}} = \alpha_1 \frac{1}{A_{i,t-1}} + \alpha_2 \frac{\Delta REV_{i,t}}{A_{i,t-1}} + \alpha_3 \frac{PPE_{i,t}}{A_{i,t-1}} + \xi_{i,t}, \quad (1)$$

$$DA_{i,t} = \frac{TAC_{i,t}}{A_{i,t-1}} - \hat{\alpha}_1 \frac{1}{A_{i,t-1}} - \hat{\alpha}_2 \frac{(\Delta REV_{i,t} - \Delta AR_{i,t})}{A_{i,t-1}} - \hat{\alpha}_3 \frac{PPE_{i,t}}{A_{i,t-1}}, \quad (2)$$

其中, $TAC_{i,t}$ 为 i 企业 t 年总应计利润, $A_{i,t-1}$ 为 $t-1$ 年总资产, $\Delta REV_{i,t}$ 为 t 年和 $t-1$ 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差额, $\Delta AR_{i,t}$ 为 t 年和 $t-1$ 年应收账款之间的差额, $PPE_{i,t}$ 为 t 年固定资产,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为回归系数; $\xi_{i,t}$ 为残差项。对模型(1)分行业进行回归,得到模型估计系数 $\hat{\alpha}_1, \hat{\alpha}_2, \hat{\alpha}_3$, 将其代入模型(2)得到操控性应计利润 $DA_{i,t}$ 。

关于真实盈余管理(REM)的测度,本文借鉴 Roychowdhury^[31] 构建的相关模型,计算生产操控、费用操控和销售操控。具体如下:

$$\frac{CFO_{i,t}}{A_{i,t-1}} = \mu_0 + \mu_1 \frac{1}{A_{i,t-1}} + \mu_2 \frac{REV_{i,t}}{A_{i,t-1}} + \mu_3 \frac{\Delta REV_{i,t}}{A_{i,t-1}} + q_{i,t}, \quad (3)$$

$$\frac{PROD_{i,t}}{A_{i,t-1}} = \gamma_0 + \gamma_1 \frac{1}{A_{i,t-1}} + \gamma_2 \frac{REV_{i,t}}{A_{i,t-1}} + \gamma_3 \frac{\Delta REV_{i,t}}{A_{i,t-1}} + \gamma_4 \frac{\Delta REV_{i,t-1}}{A_{i,t-1}} + \eta_{i,t}, \quad (4)$$

$$\frac{DISEXP_{i,t}}{A_{i,t-1}} = \delta_0 + \delta_1 \frac{1}{A_{i,t-1}} + \delta_2 \frac{REV_{i,t-1}}{A_{i,t-1}} + v_{i,t}, \quad (5)$$

其中, $CFO_{i,t}$ 为 i 企业 t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REV_{i,t}$ 为 t 年营业收入, $PROD_{i,t}$ 为 t 年生产成本, $\Delta REV_{i,t-1}$ 为 $t-1$ 年和 $t-2$ 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差额, $DISEXP_{i,t}$ 为操控性费用, $REV_{i,t-1}$ 为 $t-1$ 年的营业收入, $q_{i,t}, \eta_{i,t}, v_{i,t}$ 为残差项, μ, γ, δ 为分年度分行业回归估计系数,基于公式(3)至公式(5),计算异常生产成本扣除异常经营现金流和异常酌量费用后,得到真实盈余管理($REM_{i,t}$)。

4. 控制变量

参照耀友福等^[15]的研究,选择如下变量为控制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Cash flow*)、董事会人数(*Board*)、股权集中度(*Fshare*)、股权制衡度(*Z10*)、事务所变更(*Switch*),同时控制行业效应(*Industry*)和年度效应(*Year*)。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行为的影响,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构建的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KAM_{i,t} = \beta_0 + \beta_1 DT_{i,t} + \beta_2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w_{i,t}, \quad (6)$$

其中, $\beta_0, \beta_1, \beta_2$ 为回归系数, $KAM_{i,t}$ 为 i 企业 t 年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DT_{i,t}$ 为 i 企业 t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Controls_{i,t}$ 为控制变量。 $w_{i,t}$ 代表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盈余管理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参考温忠麟等^[32]的研究,引入盈余管理EM,构建模型(7)和模型(8),分别验证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以及数字化转型、盈余管理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共同影响。其中, $EM_{i,t}$ 表示 i 企业 t 年的盈余管理程度, $\chi_0 - \chi_2, \varphi_0 - \varphi_3$ 为回归系数, $\epsilon_{i,t}$ 和 $\sigma_{i,t}$ 代表随机误差项。其余变量的定义同模型(6),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EM_{i,t} = \chi_0 + \chi_1 DT_{i,t} + \chi_2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epsilon_{i,t}, \quad (7)$$

$$KAM_{i,t} = \varphi_0 + \varphi_1 EM_{i,t} + \varphi_2 DT_{i,t} + \varphi_3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sigma_{i,t}。$$
 (8)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个数	KAM_num	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个数
	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	KAM_words	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描述段及“审计应对”方法段的字数之和取对数
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程度	DT	数字化词频加总取对数
中介变量	应计盈余管理	DA	计算琼斯模型中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后取绝对值
	真实盈余管理	REM	参考 Roychowdhury 的相关模型计算后取绝对值
控制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Cashflow	经营现金流/总资产
	董事会人数	Board	董事会人数
	股权集中度	Fshare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股权制衡度	Z10	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事务所变更	Switch	事务所发生变更取 1,否则取 0
	行业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年度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关键审计事项数量(KAM_num)均值为 2.065,最大值为 4,最小值为 1;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篇幅(KAM_words)均值为 7.008,最大值为 7.921,最小值为 5.922。这均表明在不同的样本公司中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基于文本测度的企业数字化(DT)均值为 2.081,最大值为 5.403,最小值为 0,说明我国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且不同企业间的转型程度差异较大。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测度的应计盈余管理(DA)均值为 0.058,最大值为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N=11 45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KAM_num	2.065 0	0.640 0	1.000 0	4.000 0
KAM_words	7.008 0	0.416 0	5.922 0	7.921 0
DT	2.081 0	1.400 0	0.000 0	5.403 0
DA	0.058 0	0.060 0	0.001 0	0.331 0
REM	0.152 0	0.156 0	0.002 0	0.832 0
ROA	0.034 0	0.090 0	-1.629 0	0.604 0
Growth	0.436 0	0.191 0	0.008 0	1.687 0
Cashflow	0.208 0	1.334 0	-1.309 0	82.790 0
Board	0.053 0	0.070 0	-0.518 0	0.874 0
Fshare	8.435 0	1.669 0	0.000 0	18.000 0
Z10	32.860 0	14.960 0	1.844 0	89.990 0
Switch	1.044 0	0.843 0	0.018 0	7.056 0

0.331,最小值为 0.001。真实盈余管理(REM)的均值为 0.152,最大值为 0.832,最小值为 0.002。可见,管理层在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时,更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应计盈余管理。

(二)相关性分析

表 3 为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DT)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KAM_num)、文本篇幅(KAM_words)的相关性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会增加审计师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初步验证了假设 H1a、H1b。此外,本文检验了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自变量之间

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值)平均值为 2.01,最大值为 3.46,均小于 10,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

变量	KAM_num	KAM_words	DT	REM	DA	ROA	Growth	Cash flow	Board	Fshare	Z10	Switch
KAM_num	1											
KAM_words	0.79***	1										
DT	0.07***	0.07***	1									
REM	-0.04***	-0.04***	0.00	1								
DA	0.05***	0.04***	0.04***	0.16***	1							
ROA	-0.15***	-0.11***	-0.08***	0.18***	-0.33***	1						
Growth	0.00	0.01	-0.02**	0.10***	0.11***	0.08***	1					
Cash flow	-0.12***	-0.08***	-0.08***	0.16***	-0.17***	0.36***	0.02**	1				
Board	0.01	-0.00	-0.07***	-0.03***	-0.08***	0.03***	-0.00	0.05***	1			
Fshare	-0.09***	-0.07***	-0.15***	0.02*	-0.09***	0.15***	0.02**	0.12***	0.04***	1		
Z10	0.06***	0.06***	0.11***	0.02***	0.07***	-0.06***	0.01	-0.03***	0.02*	-0.72***	1	
Switch	0.03***	0.02*	-0.01	-0.02*	0.04***	-0.06***	0.04***	-0.01	0.00	0.00	-0.01	1
VIF	—	—	1.07	1.57	3.46	3.25	1.02	3.40	1.01	2.19	2.13	1.01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下同。

(三)多元回归分析

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表 4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实证回归结果。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T)对关键审计事项个数、文本篇幅的回归系数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审计师越易于出具较为谨慎的审计报告,表现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和文本篇幅的双重增加。这可能是由于,数字化转型中商业模式、竞争模式变革产生的系列风险强化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审计师倾向于披露更多的关键审计事项以避免自身未来面临诉讼的风险。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审计环境的变化,为满足新审计准则背景下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审计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提升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征相匹配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假设 H1a、H1b 成立,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决策效应。

2. 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5 报告了盈余管理在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关键审计事项充分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应计盈余管理的作用不显著,说明应计盈余管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表 4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回归结果(N=11 452)

变量	KAM_num (1)	KAM_words (2)
DT	0.024 1*** (4.54)	0.012 4*** (3.57)
ROA	-0.826 8*** (-9.57)	-0.375 9*** (-7.38)
Growth	0.005 9* (1.70)	0.005 9*** (2.99)
Cash flow	-0.395 5*** (-3.90)	-0.198 9*** (-2.98)
Board	0.009 2** (2.41)	0.005 0** (2.07)
Fshare	-0.002 1*** (-3.30)	-0.000 1 (-0.22)
Z10	0.006 8 (0.67)	0.014 5** (2.25)
Switch	0.044 2** (2.22)	0.012 7 (1.03)
_cons	2.040 9*** (46.58)	6.949 2*** (250.13)
R ²	0.075 4	0.064 4
Industry	YES	YES
Year	YES	YES

注: 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的影响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假设 H2a 没有得到验证。由列(4)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容易诱发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

为。列(5)和列(6)显示,在引入真实盈余管理(*REM*)作为中介变量后,企业数字化程度(*DT*)与真实盈余管理(*REM*)对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及文本篇幅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REM*对两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指标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真实盈余管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企业推动数字技术变革不仅会直接促进审计师更充分地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还会通过加剧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间接导致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水平上升。假设H2b得到验证。

表5 盈余管理对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中介效应($N=11\ 452$)

变量	应计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		
	(1) <i>DA</i>	(2) <i>KAM_num</i>	(3) <i>KAM_words</i>	(4) <i>REM</i>	(5) <i>KAM_num</i>	(6) <i>KAM_words</i>
<i>DT</i>	-0.000 6 (-1.13)	0.023 9*** (4.52)	0.012 4*** (3.56)	0.004 9*** (3.83)	0.024 5*** (4.63)	0.012 7*** (3.66)
<i>DA</i>		-0.230 3** (-2.10)	-0.044 6 (-0.64)			
<i>REM</i>					-0.094 1** (-2.34)	-0.066 9** (-2.47)
<i>ROA</i>	-0.211 5*** (-17.26)	-0.875 5*** (-10.03)	-0.385 3*** (-7.29)	0.216 4*** (9.53)	-0.806 4*** (-9.27)	-0.361 4*** (-7.06)
<i>Growth</i>	0.006 1*** (4.09)	0.007 3* (1.96)	0.006 1*** (3.08)	0.010 6** (2.26)	0.006 9* (1.80)	0.006 6*** (3.25)
<i>Cashflow</i>	-0.038 7** (-2.18)	-0.404 4*** (-3.97)	-0.200 6*** (-3.00)	0.217 6*** (5.81)	-0.375 0*** (-3.68)	-0.184 3*** (-2.75)
<i>Board</i>	-0.002 0*** (-6.34)	0.008 8** (2.29)	0.004 9** (2.03)	-0.002 8*** (-3.33)	0.009 0** (2.33)	0.004 8** (1.99)
<i>Fshare</i>	0.000 0 (0.59)	-0.002 1*** (-3.29)	-0.000 1 (-0.21)	0.000 5*** (3.32)	-0.002 0*** (-3.23)	-0.000 1 (-0.13)
<i>Z10</i>	0.002 8*** (3.02)	0.007 4 (0.74)	0.014 6** (2.27)	0.011 8*** (5.10)	0.007 9 (0.78)	0.015 3** (2.37)
<i>Switch</i>	0.003 0* (1.68)	0.044 9** (2.26)	0.012 9 (1.04)	0.002 2 (0.49)	0.044 4** (-9.15)	0.012 9 (-7.10)
<i>_cons</i>	0.079 9*** (20.88)	2.059 3*** (46.16)	6.952 8*** (245.21)	0.115 8*** (11.57)	2.051 8*** (46.54)	6.957 0*** (248.73)
<i>R²</i>	0.167 4	0.075 7	0.064 5	0.172 6	0.075 8	0.064 9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综上,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剧代理成本,诱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促使审计师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引发“治理失灵”,加深代理矛盾。同时,商业模式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加剧了管理层的业绩压力,而内部控制制度相对于数字业务发展的滞后性,也为管理层谋取私利行为创造了机会,并导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在数字技术理解与应用上的鸿沟进一步扩大。由此,在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数字化转型企业较高业绩预期的双重压力下,管理层更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迎合市场预期,掩盖短期绩效缺口。而在数字化背景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引起审计

师的高度警觉,审计师为此会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以充分提示风险并规避潜在责任。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面对数字化转型,管理层更倾向于采用隐蔽性较强的真实盈余管理实施利润操纵。一方面,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建立的数字化财务平台,有效压缩了管理层在会计政策与方法选择上的自由裁量空间^[33],削弱了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内部信息沟通效率,增强了董事会与监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效能,从而提高了应计盈余管理的实施成本^{[3]52}。在业绩压力与监管强化的双重约束下,管理层往往更倾向于通过构造真实交易实施更具隐蔽性的真实盈余管理,以实现经营现金流的调控。

(四)异质性分析

1. 基于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异质性检验

实务界普遍认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优于“非四大”,且更擅长识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风险^[25]。据此,本文以企业是否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四大”审计与“非四大”审计两组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在“四大”与“非四大”审计组中均显著,但列(1)、列(3)所示回归系数较列(2)、列(4)更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均通

表 6 基于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四大”审计 (1) <i>KAM_num</i>	“非四大”审计 (2) <i>KAM_num</i>	“四大”审计 (3) <i>KAM_words</i>	“非四大”审计 (4) <i>KAM_words</i>
<i>DT</i>	0.068 2*** (2.66)	0.023 5*** (4.33)	80.722 8*** (3.36)	14.882 2*** (3.63)
<i>ROA</i>	-2.385 5*** (-4.02)	-0.773 5*** (-9.00)	-2.590 3*** (-4.26)	-433.2211*** (-6.60)
<i>Growth</i>	-0.026 7 (-0.35)	0.005 6* (1.68)	1.3657 (0.02)	5.8348*** (2.60)
<i>Cashflow</i>	-1.099 4** (-2.30)	-0.304 9*** (-2.95)	-798.369 2* (-1.79)	-140.535 8* (-1.81)
<i>Board</i>	0.025 4 (1.61)	0.008 2** (2.12)	-6.819 9 (-0.65)	4.693 2* (1.65)
<i>Fshare</i>	-0.008 0*** (-2.87)	-0.001 5** (-2.27)	-0.325 0 (-0.13)	-0.890 7* (-1.91)
<i>Z10</i>	0.013 9 (0.22)	0.008 1 (0.78)	63.447 9 (1.10)	4.020 3 (0.53)
<i>Switch</i>	-0.134 2* (-1.74)	0.058 5*** (2.88)	-62.936 3 (-0.88)	9.987 7 (0.67)
<i>_cons</i>	2.205 4*** (9.61)	2.022 0*** (45.72)	1 420.812 2*** (7.77)	1 164.047 5*** (36.36)
<i>N</i>	869	10 583	869	10 583
<i>R²</i>	0.312 3	0.077 2	0.300 9	0.066 7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经验 <i>p</i> 值	0.010**	0.000***		

注:“经验 *p* 值”用于检验组间 *DT*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 Bootstrap500 次得到,下同。

过了显著性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企业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时,审计师会披露更多数量的关键审计事项,并撰写更长的文本篇幅,从而增强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以应对和释放审计风险,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2.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的传导效应,可能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现有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通常面临更强的竞争压力,其数字化转型的动机与开放意愿也更强烈,因而数字化投入程度更高,^[34]更高的转型程度更易引发审计师的重点关注,进而可能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产生更显著的影响。本文以企业是否属于国有控股为标准,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结果如表7所示。从结果可知,列(2)、列(4)所示回归系数较列(1)、列(3)更为显著,且组间系数差异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决策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和市场占有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市场压力小,对前沿数字技术关注度不高,创新转型意愿较弱。非国有企业往往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意愿更强,而这种转型往往伴随高投入与高风险,进而强化了审计师对相关业务风险的感知和关注,使其更为主动的披露更多关键审计事项。

表7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1) <i>KAM_num</i>	非国有企业 (2) <i>KAM_num</i>	国有企业 (3) <i>KAM_words</i>	非国有企业 (4) <i>KAM_words</i>
<i>DT</i>	0.055 1** (2.48)	0.021 7*** (3.95)	59.658 9** (2.52)	15.713 1*** (3.67)
<i>ROA</i>	-0.390 6 (-0.80)	-0.837 2*** (-9.51)	-425.278 5 (-1.23)	-515.077 8*** (-7.50)
<i>Growth</i>	-0.007 5* (-1.77)	0.007 8 (1.43)	-2.669 2 (-0.54)	6.823 5** (2.32)
<i>Cashflow</i>	-0.979 0*** (-2.40)	-0.385 0*** (-3.68)	-564.518 7* (-1.90)	-177.267 9** (-2.21)
<i>Board</i>	0.000 4 (0.03)	0.010 3** (2.54)	1.372 3 (0.13)	7.036 9** (2.40)
<i>Fshare</i>	-0.000 3 (-0.13)	-0.002 2*** (-3.25)	1.579 6 (0.92)	-0.090 3 (-0.18)
<i>Z10</i>	0.072 2 (1.31)	0.003 1 (0.30)	76.461 1* (1.87)	13.312 6* (1.68)
<i>Switch</i>	0.098 7 (1.45)	0.038 5* (1.85)	38.044 1 (0.77)	3.588 7 (0.23)
<i>_cons</i>	1.945 3*** (12.05)	2.045 3*** (44.16)	982.214 3*** (6.61)	1 128.643 4*** (33.47)
<i>N</i>	854	10 598	854	10 598
<i>R²</i>	0.194 0	0.122 8	0.079 2	0.065 0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经验 <i>p</i> 值	0.060 *	0.002 ***		

五、稳健性检验

(一) 内生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35]。将高于数字化转型均值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低于数字化转型均值的企业作为对照组。考虑总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Cash flow*)、董事会人数(*Board*)、股权集中度(*Fshare*)、股权制衡度(*Z10*)、事务所变更(*Switch*)等因素,使用 1:1 最近邻匹配,在控制行业与年份后进行逻辑回归并计算倾向得分值,采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8 列(1)和列(2)所示。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文本篇幅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PSM 检验后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前文结论仍然成立,结果稳健。

2. 加入行业与年份交互项变量

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加入行业与年份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21]。由表 8 列(3)和列(4)可知,在控制行业与年份的交互项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关键审计事项个数、文本篇幅的相关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进一步排除了本文的内生性问题,表明上述回归结果稳健。

表 8 内生性检验

变量	倾向得分匹配法		控制行业与年份交互项	
	(1) <i>KAM_num</i>	(2) <i>KAM_words</i>	(3) <i>KAM_num</i>	(4) <i>KAM_words</i>
<i>DT</i>	0.027 0*** (4.75)	15.344 4*** (3.35)	0.024 1*** (4.55)	17.751 7*** (4.23)
<i>ROA</i>	-0.916 8*** (-8.74)	-673.880 2*** (-6.94)	-0.827 5*** (-9.57)	-508.071 9*** (-7.53)
<i>Growth</i>	0.008 5 (1.24)	13.867 9* (1.68)	0.005 9* (1.70)	5.650 8** (2.46)
<i>Cash flow</i>	-0.324 7*** (-2.91)	-104.239 5 (-1.13)	-0.396 3*** (-3.91)	-196.516 0** (-2.53)
<i>Board</i>	0.006 6 (1.56)	6.361 6** (1.97)	0.009 3** (2.41)	6.556 9** (2.37)
<i>Fshare</i>	-0.001 4** (-1.96)	0.623 9 (1.08)	-0.002 1*** (-3.29)	0.042 2 (0.09)
<i>Z10</i>	0.015 0 (1.28)	25.502 5*** (2.59)	0.006 9 (0.68)	16.495 5** (2.14)
<i>Switch</i>	0.039 8* (1.82)	6.081 5 (0.35)	0.044 3** (2.23)	7.436 6 (0.49)
<i>_cons</i>	2.029 7*** (42.42)	1106.395 2*** (30.10)	10.337 0 (0.63)	4457.291 8 (0.36)
<i>N</i>	9 740	9 422	1 1452	1 1452
<i>R²</i>	0.075 0	0.057 9	0.075 4	0.061 1
<i>Industry/Year</i>	YES	YES	—	—
<i>Industry×Year</i>	—	—	YES	YES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1.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过程,其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为检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将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36],结果见表9。由表9列(1)和(2)可知,数字化转型与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文本长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互为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假设检验的结论稳健。

2. 替换变量

为减少数字化转型衡量误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37],本文使用“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DT2)这一虚拟变量替换原有的连续型衡量指标,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9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DT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改变核心变量的度量方式后,数字化转型依然能显著提升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9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替换变量	
	(1) KAM_num	(2) KAM_words	(3) KAM_num	(4) KAM_words
DT	0.029 5*** (4.61)	19.104 3*** (3.67)		
DT2			0.061 8*** (4.66)	49.380 7*** (4.82)
ROA	-0.473 7*** (-3.78)	-216.552 2** (-2.32)	-0.743 0*** (-7.63)	-459.793 4*** (-6.43)
Growth	0.005 1 (1.46)	6.546 4* (1.87)	0.006 2* (1.79)	5.479 3** (2.36)
Cashflow	-0.716 9*** (-5.44)	-509.741 0*** (-4.86)	-0.351 3*** (-3.77)	-221.015 4*** (-3.17)
Board	0.003 5 (0.75)	2.599 7 (0.75)	0.012 1*** (3.61)	10.340 0*** (4.23)
Fshare	-0.001 7** (-2.15)	0.816 9 (1.31)	-0.002 4*** (-4.26)	-0.056 8 (-0.14)
Z10	0.024 5** (1.98)	30.238 8*** (3.06)	0.004 6 (0.51)	16.367 0** (2.41)
Switch	0.040 0 (1.61)	22.230 2 (1.19)	0.049 2*** (2.82)	13.255 5 (0.99)
_cons	2.059 9*** (38.11)	1138.313 9*** (27.48)	2.012 1*** (51.98)	1072.955 2*** (38.20)
N	7 756	7 756	14 605	14 605
R ²	0.077 6	0.061 9	0.072 1	0.060 7
Industry/Year	YES	YES	YES	YES

六、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在数字治理新格局下,提升数字化环境中的审计风险控制能力,已成为推动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发

展的关键。本文以201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文本篇幅越长。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代理问题,增强了管理层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而强化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而应计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提升效应在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该研究结果有助于审计师应对审计风险,助力企业提升治理水平,并为利益相关者准确识别信息提供了依据。鉴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审计师在开展审计业务的过程中,需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环境下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所蕴含的审计风险,继而加强相关领域的审计程序,并着重在关键审计事项中进行详细披露,全面提升审计报告质量。同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应积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借鉴国际审计机构在信息化建设及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平台赋能审计工作,显著提升审计效率与效果。

二是,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需及时抓住机遇进行变革,重塑与数字化水平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国有企业应将数字化战略与信息化建设作为重大战略持续推进,为生产经营注入新活力。转型过程中,也须规避基于同群效应的盲目模仿,审慎评估自身资源与条件,实施差异化路径。企业必须在吸纳技术红利的同时,秉持长期主义理念,对商业模式颠覆性创新的潜在风险进行审慎管控。企业应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同监督,结合自身治理经验,利用数字化发展契机,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三是,在持续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下,政府部门应有效识别并规范企业利用复杂信息系统捏造、粉饰或隐藏财务信息的新型行为,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作用,引导利益相关者准确辨识资本市场中的有效信息,作出理性投资决策。以此共同推动实现高水平信息化建设与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 [1] 贺正楚,潘为华,潘红玉,等.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制造过程与商业模式的异质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3(3):162-177.
- [2] 李滢,李金嶽,刘向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利分配[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2):114-126.
- [3] 刘畅.数字化转型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J].科学决策,2022(12).
- [4] 罗进辉,巫奕龙.数字化运营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J].管理科学,2021,34(4).
- [5] 徐子尧,张莉沙.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22(2):25-35.
- [6] 史亚雅,杨德明.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创新与盈余管理[J].科研管理,2021,42(4):170-179.
- [7] 张嘉伟,胡丹丹,周磊.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22,44(1):122-139.
- [8] 李芳,于寅健,王松.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会影响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吗?——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检验[J].财经论丛,2023(4):69-79.
- [9] 张永坤,李小波,邢铭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审计研究,2021(3):62-71.
- [10] 邹美凤,张力丹,张信东.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风险[J].中国注册会计师,2022,(10):35-41.
- [11] 刘斌,汪川琳.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3(1):69-81.
- [12] 占韦威.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陆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4):159-172.
- [13] 翟华云,李倩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7(2):69-80.
- [14] 丁方飞,陈智宇,李苏,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基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转换视角的研究[J].

-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6(5):35-46.
- [15] 耀友福,周兰.企业数字化影响关键审计事项决策吗?[J].审计研究,2023(1):123-135.
- [16] 倪国爱,江寅炜.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22,38(3):37-43.
- [17] 刘淑春,闫津臣,张思雪,等.企业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J].管理世界,2021,37(5):170-190.
- [18] 莫冬燕,方芳,王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30-141.
- [19] 陈德球,胡晴.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范式创新与实践前沿[J].管理世界,2022,38(6):213-240.
- [20] 董明晴,张嘉伟.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信息传递还是印象管理[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10):113-126.
- [21] EKATA G E. The IT productivity paradox: Evidence from the Nigerian banking industry[J].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012(1):1-25.
- [22] 易露霞,吴非,徐斯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业绩驱动效应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21(8):15-25+69.
- [23] 李芳,于寅健,王松.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会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2):75-93.
- [24] 李晓月,肖翔,代庆会.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属性与关键审计事项沟通——基于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综合分析[J].管理学报,2020,33(2):76-87.
- [25] 吴武清,赵越,苏子豪.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审计费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新证据[J].审计研究,2022(1):106-117.
- [26] 吴芃,陈思雨,任婕好,等.真实盈余管理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4):103-115.
- [27] 张睿,冯均科.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公司的审计聘用制度吗[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1):216-228.
- [28] 李嘉宁,伍利娜,肖帅莹.企业ESG表现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9(1):23-31.
- [29]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 [30] DECHOW P M, SLOAN R G, SWEENEY A 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1995(2):193-225.
- [31]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3):335-370.
- [32]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33] GOLDFARB A, 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9(1):3-43.
- [34] 庞瑞芝,刘东阁.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J].南方经济,2022(9):97-117.
- [35] 李胜楠,朱叱云,王佳琦,等.国企混改中的治理机制非对称性与风险承担[J].南开管理评论,2024,27(9):113-126.
- [36] 杨德明,夏小燕,金淞宇,等.大数据、区块链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20(4):68-79.
- [37] 聂兴凯,王稳华,裴璇.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J].会计研究,2022(5):17-39.

(下转第114页)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ownship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LIU Lijuan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facing dual pressures from social found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Specialized and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face limitations in responding to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posed by increased governance affairs,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standardized governance methods, forcing township governments to innovate their mechanisms. The village cadre-responsible system, as an informal system in township governa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norm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with the formal hierarchical system, forms a dual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It effectively activates the initiative of grassroots cadres, enhances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ownships, and thus strengthens the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This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grassroots society, it is essential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ffectiveness. Moreover,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nee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tangible governance outcomes through mechanism innovation.

Key words: inform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dual interaction;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魏 霄)

(上接第 95 页)

Wil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act Auditors'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An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arnings Management

LI Fang, ZHANG Zhiru, WANG S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ve opened up new avenu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which in turn may impact auditors'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uditors'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utilizing panel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7 to 2022, and verifi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number and textual length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audit reports. The digital mechanisms intensify management's motivation for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which in turn enhances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Notably,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exert different effects in this process: given the dual pressure of performance and supervis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mpts the management to employ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to manipulate profits, thus affecting auditors'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contrast,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does not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high-quality audits are more vigilant toward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s du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ulting in a corresponding increase i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key audit matters. Thes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mpanies to optimize their governance, and for auditor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audit reports. Additionally, they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stakeholders in terms of accurately assessing enterprise value and making informed investment decision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earnings management; digital technology platform;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责任编辑:魏 霄)